

沈从文传略

沈从文[苗](1902. 12. 28-1988. 5. 10)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

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

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间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

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赴美国讲学。

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著作书目：

《鸭子》(小说、戏剧等合集)1926，北新
《蜜柑》(短篇小说集)1927，新月
《入伍后》(小说、戏剧合集)1928，北新
《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1928，新月
《老实人》(短篇小说集)1928，现代
《阿丽思中国游记》(童话)1928，新月
《篁君日记》(中篇小说)1928，文化学社
《山鬼》(短篇小说)1928，光华
《雨后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28，春潮书局
《长夏》(短篇小说)1928，光华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2卷，童话)1928，新月
《不死日记》(短篇小说集)1928，人间
《呆官日记》(中篇小说)1929，上海远东书店
《男子须知》(短篇小说集)1929，红黑
《十日夜间》(小说、戏剧合集)1929，光华
《神巫之爱》(中篇小说)1929，光华
《旅店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30，中华
《凤子》(短篇小说集)1930，杭州苍山书店
《-个天才的通信》(中篇小说)1930，光华
《沈从文甲集》(短篇小说集)1930，神州
《旧梦》(长篇小说)1920，商务
《石子船》(短篇小说集)1932，中华
《沈从文子集》(短篇小说集)1931，新月
《龙朱》(短篇小说集)1931，上海寻乐轩
《-个女剧员的生活》(长篇小说)1931，上海大东书局
《虎雏》(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记胡也频》(散文)1932, 光华
《泥涂》(中篇小说)1932, 北平星云堂书店
《都市一妇人》(短篇小说集)1932, 新中国
《慷慨的王子》(短篇小说)1933, 良友
《阿黑小史》(中篇小说)1933, 新时代
《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1933, 现代
《一个母亲》(短篇小说)1933, 上海合成书局
《沫沫集》(评论集)1934, 上海大东书局
《游目集》(短篇小说集)1934, 上海大东书局
《如蕤集》(短篇小说集)1934, 生活
《从文自传》1934, 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散文)1934, 良友
《边城》(中篇小说)1934, 生活
《八骏图》(短篇小说集)1935, 文生
《从文小说集》1936, 上海大光书局
《湘行散记》(散文集)1936, 商务
《从文小说习作选》(上下册)1936, 良友
《月下小景外八篇》(短篇小说集)1936, 复兴
《新与旧》(短篇小说集)1936, 良友
《废邮存底》(书信体文论集)与萧乾合著, 1937, 文生
《一个妇人的日记》(短篇小说)1938, 晨光
《记丁玲》(续集, 散文)1939, 良友
《湘西》(散文)1939, 长沙文史丛书编辑部
《昆明冬景》(论文、散文合集)1939, 文生
《主妇集》(短篇小说集)1939, 商务(长沙)
《绅士的太太》(短篇小说)1940, 上海三通书局
《如蕤》(短篇小说集)1941, 上海艺流书店
《烛虚》(散文评论集)1941, 文生
《沈从文自传》1943, 上海中央书店
《春灯集》(短篇小说集)1943, 开明(桂林)
《云南看云集》(评论集)1943, 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黑风集》(短篇小说集)1943, 开明(桂林)
《长河》(第1卷, 长篇小说)1945, 昆明文聚社
《沈从文小说选集》1957, 人文
《沈从文短篇小说选》1978, 香港文教出版社
《从文小说选》1980, 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从文散文选》1980, 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沈从文散文选》1981, 湖南人民
《沈从文小说选》1981, 湖南人民
《沈从文小说选》(1-2)1982, 人文
《沈从文散文选》1982, 人文
《沈从文文集》(1-12)1982—1984, 花城、香港三联
《沈从文选集》(1—5)1983, 四川人民
《神巫之爱》(小说、散文集)1983, 花城
《凤凰》(小说散文集)1986, 文化艺术
《沈从文代表作》(小说、散文集)1987, 黄河文艺----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沉默无言”的暗影——读沈从文的《黔小景》

作者：王晓明

十年前我读过这篇《黔小景》，记得是一目十行，很快就看完了，随手往桌上一搁，心中并不起什么反应。那时候我正扬眉捋袖地写一篇长长的毕业论文，满脑子神圣的文学理想，可这《黔小景》写的是什么呢？贵州三月的深山和细雨，绵绵雨雾中的阴晦和泥泞，在这泥泞中负重奔走的商人，以及迎接这些商人的客舍，客舍中的热水，糙米饭，和发硬微臭的棉絮：这一切都与我隔得太远了。一篇小说要获得读者的理解，也需这读者有一份适合去理解的心情，以我那时的天真和偏执，自然是难与这《黔小景》发生共鸣的。

十年过去了，我对人生的体验逐渐增加，再重读这篇小说，感觉就和当初大不一样。譬如第一段，一上来就打动了，特别是“大小路上烂泥如青”、“挨饿太久，全身黑乎乎的老鸦”这几句，一再激起我的想象，造成我的错觉，仿佛自己也正陷在那泥泞之中。我由此也领会了作者的用心，他是精心安排了这样一段动人的开头，要将读者一下子拽入阴晦迷蒙的情绪氛围。

作者一步步展开他的叙述，我对那些长途跋涉的商人，也就不自觉地生出羡慕之情。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并没有把握，却毫不犹豫，只管在家中吃饱睡足，然后选一个合适的日子上路。道路非常难走，雨，泥，崩坏的土坎，肩上的重担，他们却并不叫苦，只依着习惯一步步走下去。如此劳累了一天，却并不都能找到合意的客舍，不是饭食太粗，就是被席太脏，可他们也不计较，依旧快快活活地烫脚，嚼饭。倘若能喝到一碗酒，那就兴致更高了，会围着火堆哈哈笑着讲许多粗野有趣的故事。实在酒也喝不成，鸡蛋也买不到，那就倚在门边，看看晚霞，开开玩笑，也能轻松地消磨黄昏。即便夜深人静的时候，附近山野中的虎啸，或者远处村寨械斗的火炮，将他们从梦中惊醒，他们也不在意，最多静听一阵，就还是闭上眼睛，继续打他们的呼噜。这些人的心思是如此简单，活得如此自然，除了眼前的实际事情，其他一概不管，没有深沉的感慨，也不作高远的遐想，一切都听凭本能和习惯，自自然然地做去：倘若你是一个困居城市的知识分子，被种种复杂卑琐的人事纠缠得精疲力尽，偏偏又对社会抱有许多理想，它们的破灭更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时刻读到这些商人，你会不会产生一种神往之情呢？也许在一刹那间，你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倘若我也能以他们这样的心态去承受人生，也能过这样平常自然的生活，那有多好？看得出，作者在《黔小景》的前半部分里，正是要凸现商人们这种人生态度的魅力，凸现他们这生活的诗意。我并非出身农家，更缺乏作者对湘川黔乡村世界的那一份血缘亲情，但我还是被他的描写深深感动了，那样平常自然的心态，那样淳朴简单的心灵，它们对我产生一种难以说清的诱惑。我虽然学不成他们那样，却觉得那确实有一种美。

但是，读到小说的中间部分，读到那叔侄俩看着客舍老主人从内屋取来的鞋子互相打趣，作者却又点明，这两双鞋原属于老主人刚刚死去的儿子时，一种模糊的不安，却从我心头悄悄升起。在这贵州的深山里，官道旁的小站上，其实并不是只有平淡和自然，就在商人店主的笑谈背后，分明还有悲惨和不幸，那叔侄俩指指点点的满油菜花的菜圃旁，不就蹲着一座早夭的青年人的新坟吗？叔侄俩眺望着天边的晚霞，作者却写道：“黄昏景致更美丽了，晚晴正如人病后新愈，柔和而十分脆弱，仿佛在微笑，也仿佛有种忧愁，沉默无言。”这似乎是个意味深长的暗示，我越往下读，就越能够清楚地体味它，在作者描述给我看的小说画面的深处，确实有一片“沉默无言”的东西，就仿佛那客舍房子里的黑暗，即便你站在门口，沐浴在明亮的霞光中，还是会清楚地感觉到它在你身后的存在。那客舍的孤独的老主人，本来是想无视这“沉默无言”的东西的，他甚至为了天晴而快乐，想高高兴兴度过自己的生日。可是，作者终于拗不过自己的敏感，最后还是写出了老人的失态：他无法对客人坦言儿子的死，只好用谎话来应付，他也压不下因客人问及他家人而起的激动，虽然早早就上床了，却一直睡不着。就像是受不了屋子里黑暗的压迫，他又爬起来走近灶口的火光，加入两位客商的闲聊。他是那样亢奋，编造了一大堆自慰的谎言，仿佛是要使退到屋角的暗影相信，他的生活并非孤苦。一直讲到那年轻商人熬不住去睡了，他还是不愿起身，依旧坐在灶口，一任闪烁的火光照亮他的前胸。可是，第二天天亮后，两位商人起身一看，发现这老人依旧坐在熄了火的灶口，一动不动，原来他半夜里死了，还是被那“沉默无言”的黑暗吞没了。

作者写到这一步，整篇小说的意蕴急转直下。无论我先前怎样羡慕那种平常自然的人生，现在也禁不住要发生怀疑，莫非那人生的诗意也如这老人的生命一样脆弱？显然作者也

掩饰不住自己的怀疑，到小说的第三节，他竟设想那叔侄两位商人将遇到这样一连串可怕的情景：先是路边土堆上的虎豹的脚印，使他们暗自一惊，知道在夜晚，这同一条路上，曾出没过什么样的猛兽；接着是树林中悬挂着的肿胀的人头，使他们禁不住要想象，从这林中奔出来的劫道者的凶相；再接着是路旁商人或者军人模样的尸体，最后是一群一群的士兵，用绳子牵着淌血的俘虏，肥壮的耕牛，甚至还有半大的孩子，肩挑或许就属于自己父兄的血淋淋的人头……我不禁要想，那叔侄俩昨天投宿之前，是不是就已经领教过这样可怕的场面？倘若已经见过了，他们又如何从心头拂去这些刺激，依旧笑呵呵地招呼客店主人呢？作者每讲一处可怕的场面，都要写一笔商人的表情，或者“各存戒心，默 地又走开了”，或者“无人过问，依然是默 地看”，或者“这都早已成为一种习惯，真实情形谁也不明白，也不必过问的”。我似乎懂得了，为什么夜半被虎啸惊醒，这些人依然能倒头睡去，连尸身和人头都不断见过了，几声虎叫又算得什么？但是，如果这些人的平常和自然，竟有许多是来自一种见多了惨酷景象而习以为常的麻木，一种习惯于忍受不幸，一看见不幸降临便作鸵鸟式逃避的浑浑噩噩，你先前从他们生活中感觉到的诗意，是不是也就有点变味了呢？那原先是伏在小说画面深处的“沉默无言”的阴影，终于穿过晚霞般的人生景象，在我眼前逐渐扩大，最后将一切都罩住了。

到这时，我再读小说的最后一段，便觉出了作者的勉强。无论他是怎样强调商人对路上那些惨酷景象的不在意，也唤不回读者对他们的羡慕了。我倒是想起了他的一句名言：“美丽总是使人愁。”既然最后是引起你的忧愁，你还能继续沉醉入对那美丽的迷恋吗？或者，正因为有这忧愁的衬托，美丽本身也就更能够引动人的心绪？我不知道作者是否存心要安排小说意蕴的前后变化，来突出这种令人迷惑的复杂情味，也许他确是有意如此。在我自己，却好像在多日的疲惫之后，坠入一个轻松的好梦，正做在高兴处，却被人一下子推醒，迷迷糊糊地要想寻回那梦境，已经寻不回了，那不过是一个梦。

一九九二年十月上海

（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小说家的笔折断以后

书人书事

聂作平

一身整齐的中山装，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沈从文慢慢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幽深静寂的院落里，大墙外喧嚣的市声被浓密的树荫和九重飞檐托起的天空隔开了；瘦瘦的沈从文在一件件曾作过历史见证人和旁观者的文物间徘徊——这便是我所想象的一个被折断了笔的小说家的苍凉晚景。

众所周知，由于我们这个民族那过于宏大因而也就过于恐怖的革命情结，作为汉文学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沈从文49年以后再也不能写那些关于湘西的性灵文字了，从这一年到他去世，其间是漫长的40载。四十春秋，我们完全可望他写出更多的《边城》，更多的《湘西散记》，然而，造化弄人，小说家沈从文竟然在创作生命最旺盛的年代折断了天才的笔。

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

度神经错乱。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都已不合时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行。

文物有幸，得遇沈先生这样的知己和真爱。从沈从文转向文物的动机来看，未尝没有避祸的初衷，但正如语言学家、沈的连襟周有光所认定的：“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于是乎，我们才看到了当一个小说家的笔折断以后，他仍然散发出的人格的光芒与学术的珠辉，才看到了堪称巨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这册性灵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时至今日，在沈先生作古十年后，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地宣称：一个天才的作家哪怕被迫与他钟情的文学分手，他仍可能在那些与文学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是，如同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都可以想象或体会得到一样，尽管沈从文以生命的将近一半悠游在文物之间，并颇有建树，但作为一个曾经与语言达到了水乳交融状态的小说家而言，他肯定永远无法释怀于被剥夺了的创作权利。因此，沈从文一度仍梦想将折断了的笔重拾起来，他的夫人回忆说：“沈从文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当北京文联偶尔请他参加一些活动时，他总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并在一次会上自语：“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多年以后，沈从文在回忆起他作为文物工作者的岁月时曾写道：“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在这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怅望里，我们没法回避沈从文这一偶在生命个体对于浮生若梦的疑惧和焦虑，没法回避那用了整整四十年来独自承受的那一份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与伤。

哲人其萎，中年以后的沈从文除了留给我们一部关于古代服饰的巨著和这本后人编辑的随笔体文物研究文集外，便只有高大的午门城墙下一个孤独而绝望的背影了。1949年，给沈从文的命运带来不祥阴影的是郭沫若那篇短文，30年后，代表了沈从文几十年文物研究成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为之作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沫若。历史出人意料的幽默感，常常令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只得欲说还休——而据陈徒手先生的文章讲，沈从文去世前不久曾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编辑整理】

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海读《沈从文文集》随想

作者：王晓明

按照既定的读书计划，我最近通读了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因为事先就带着所谓“研究”的功利目的，所以在逐页翻阅的同时，不免随时记下一些即兴的体会。其中有一些似乎是可以用来勉力编织，组成一种对沈从文的系统认识的；但更多的，却显然是那种突然而起的随想，既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也来不及接受作品的验证，我甚至不能肯定，它们是否都值得作进一步的整理和发挥。干脆，就这样把它们一段一段地抄出来吧，即便是山间道旁草丛中的一瓶一纸，有时候不也能获得匆匆行路者的好奇的一瞥么？

在理智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有一位哲学家甚至断言，生命就是由无数个现在所构成。但是，在感情上，我们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说来奇怪，我们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我们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我们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

如果你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你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我们更不会忘记自己跨入成年时的那种兴奋，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第一次按照自己内心的命令去投入人生，第一次试着给自己选定跨步的方向，整个世界都仿佛变了样子，那些紧张和欣喜，犹豫和欢乐，你真是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的。更不要说我们的初恋，我们对异性的第一次隐秘的钟情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想象，那和意中人擦身而过时的战栗，甚至那周围的一草一木，都会不断地在你脑中重现，使你禁不住要发生新的陶醉。当然，在这些记忆中有失望，有凄惶，有愤怒，甚至有悲伤，但是，那毕竟是我们生机最旺盛的岁月，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即便是痛苦，那也是因为生命力的跃动才引起的痛苦，就在使你不快的同时，它也让你重新体验到了昔日那些不可遏止的生命的冲动。因此，我们越是远离那一段岁月，这痛苦的记忆就越是变化，种种令人不快的因素仿佛经过了重新的处理，最后汇聚成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和那些单纯使人欢愉的记忆相比，这种淡档的惆怅显然更容易使你心醉。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对于自己青春年华的深切眷恋，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体验这种激情。也许，是因为只有在那个年龄上，我们的感觉能力才最为活跃，它已经生长健全，却又还没有遇到成见的过分干扰，因此，它这时候摄取的印象就特别鲜明？也许，是因为这些印象渗透了我们自己的青春气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是远离青春的阶段，在感情上就越是要对它们发生迷恋？也许，这里面还有某种更为深层的种族乃至人类的遗传心理在发生作用？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因为这些解释似乎都对，又似乎都不太对。我只能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对自己少年岁月的无法抑制的亲切感情，正是人类的一种非常珍贵的美好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它充当了人类艺术的接生婆。如果没有它，恐怕许多伟大艺术品的产生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这套《沈从文文集》给我的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和这种美好情感的血缘联系。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我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这种动人的情感里去了。

一九八五年初夏，我在北京听一位研究沈从文的专家闲聊，才知道沈从文原来还有那样一个苗族文化的背景，他不但生长在湘西苗族最集中的区域，而且自身就有着四分之一的苗族血统。我不禁深感兴趣。作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对其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我是从老舍身上就已经看出了的，我相信沈从文的创作肯定会再次证明这一点。这回重读他的小说，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迹象；还真让我想对了，在沈从文的笔下世界里，你简直到处都能感觉到苗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

最触目的，自然是那些直接描述苗族生活的作品。无论是写于二十年代晚期的《阿丽丝中国游记》，还是三十年代末问世的散文集《湘西》，只要一谈到苗族的历史和风情，沈从文就立刻会改变那种惯常的含蓄态度，毫不掩饰地夸赞苗人如何纯朴，怎样善良，同时更愤慨地数落历朝历代的中原统治者如何对苗族人民肆行压榨，看那口气和姿态，简直像一个苗族的代言人。至于那些描绘苗族青年恋爱故事的小说，譬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和《神巫之爱》，就更是殚精竭虑，仿佛把世间一切美丽的形容词都堆到人物身头，他都还嫌不够。每当读到这些地方，我都忍不住要暗暗发笑，作家为苗族人民唱颂歌的心情，未免也太急切了。

但我说他的艺术世界处处体现出苗族文化背景的影响，却主要不是指这些天真的颂歌。你仔细端详他的抒情姿态就会发现，正是在这里，才更鲜明地闪射出苗族传统心理的折光。仅从我翻阅的少数几本介绍苗族概况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经受了多么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局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狂悲大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托庇于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化外之民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

反抗之心……

我上面的这一番概括当然是片面的，可就是依这样片面的角度望过去，也已经能在沈从文笔下看到不少与之契合的例证了。那渗透他几乎全部创作的对于都市文明的反感情绪，那总是将沉痛隐蔽起来，而以平静的语气出之的叙述态度，那烘托诗意的神来之笔和冗长乏味的分析文字之间触目的不协调，还有那经常会溢露出来的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和傲气：仅仅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窥见了那苗族文化心理的暗中牵制呢？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批评对象的客观性的怀疑与日俱增，“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己”的响亮口号，已经传遍了整个文学批评界，甚至还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以所谓“创造性误解”的说法，博得了不少中国同行的赞同。但是，尽管如此，我对沈从文的小说读得越多，却越是禁不住想从另一方面来作个补充：我们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终究只能说出一家之言的大前提下，恐怕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贴近我们的研究对象，努力体会作家打量世界的独特眼光，掌握他从事创作的基本出发点。^①也许我是太固执了，我总以为，批评家无权空悬一把标尺去衡量作家，严格说来，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艺术世界就越是独特，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与众不同的尺寸建造起来的，批评家只有在初步掌握了建造者的那一套独特尺度以后，才可能比较准确地看出，这个世界哪些地方是最精巧，哪些地方又有缺陷。如果连这第一步的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到，就一头扎进自己的主观理解当中去，那就很可能会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弄出许多并非创造性的误解来。

就以沈从文为例吧，我们看他的身世、自传就能够知道，他的全部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作证：他是一个颇为独特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认真描绘现实景况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而那些对自己的印象世界有明确分析的作家又不同，吸引他的主要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如薄雾般飘忽的心境，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他极力想捉住它们，在稿纸上绘出它们，却又总是捉不牢，绘不清，看看像是把握住了，写出来却觉得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常常为此苦恼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他都不敢说已经基本上解除了这种苦恼。他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当然有许多原因，我无法在这里一一罗列。但我却愿意指出，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你可以责备他这做法不合时宜，但却不能否认，那种朦胧的情绪，正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用来建造自己小说世界的基本材料。不论我们预备从怎样的角度去评判他，最初的分析恐怕都应该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开始。

也正因为这样，我很难赞同过去对沈从文的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在我看来，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你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我们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实体性。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的那种神往和迷醉感情，你又能怎么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你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我并不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就十全十美，对于有些过于亢奋的溢美之辞，我虽然能够理解，却也并不赞同。我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我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在阅读他作品的过程中，我接连不断地获得各种彼此矛盾的印象。他分明一直主张作家不要去管政治，可他自己的小说中，却有好几篇都是在刻画革命者的英姿。他早期也曾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描绘都市里的各种人物，不用说，他的脸色是不大好看的，几乎篇篇都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敌意；可有时候，他又会一反常态，以一种暗含欣赏的态度来描绘都市青年，如果不看署名，我还会怀疑这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当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风情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你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如果我们转入纯粹艺术形式的领域里，

那矛盾的现象就更多了。他分明是一个讲究含蓄的作家，可你读读那一篇《哨兵》，那对鬼魂的渲染多么用力。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有点像散文，似乎他并不怎样注意结构的锻炼，可你看看《灯》那样的小说就会明白，他其实是非常喜欢摆弄结构的。他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不擅长凭空虚构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自己的亲历或耳闻作底版，可你如果真把他对自己的许多描述当作实事，却又是上他的当了，那分明有许多是他编造出来的呢。

但我真正感到沈从文的复杂，还是在读完文集的最末一本。掩卷回想之后，我越来越认真地感觉到，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都市，赞美湘西，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我不怀疑他对绅士阶级的憎恶，他对那班教授先生们的尖刻的讽刺，也无疑是出自真心。可是，他自己不就在努力加入绅士阶级的行列，也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了吗？他那样热烈地赞美乡下人单纯朴素的性爱关系，可在自己的恋爱生活里，他却也不像那些遭他白眼的知识分子一样，寄出过一封接一封美丽动人的情书吗？倘说他在感情上始终和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实际的行为上，他却越来越和那都市的精华——知识阶级融合在一起了。在许多时候，他似乎仅仅只在笔下倾心于过去，一旦离开写字台，他倒还是愿意获取现在的青睐的——如果我这样说，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吧？

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的整个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除非他真正实践他在一篇小说集序言中宣布的计划，重新回到那个湘西土著军队的司书的位置上去，他就不要想摆脱这个矛盾。它必然会贯穿他的整个文学活动，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文学成就。我不禁想，如果抓住这一点分析下去，说不定有可能获得若干意想不到的结论呢。我为什么不这样来试一试？

这一次的阅读经验使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试图去分析作家内心状态的研究者的困境是多么严重。他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阅读感受，其他一切材料，实际上都仅仅只有参考的价值。可是，一个人阅读时的感受是一回事，他事后对这感受的归纳又是一回事；每一个新的印象都会改变原有的感受，而你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每个新的印象本身又是那样地充满了矛盾：如果研究者最终凭借的，竟只能是这样一种微妙多变的东西，他能不能不陷入困境吗？如果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那倒省事，放手挥洒就是了。可如果他偏还要想显得客观一些，想使自己的判断多少带有一点学术性，那他简直就是困难重重。在把自己的感觉确定为分析依据的时候，他必须特别小心，稍一恍惚，就可能滑到以意为之的歧路上去。①说句实话，以我们目前的精神准备，究竟能否摆脱这方面的困境，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现在的研究到底能达到多大的学术性。堆在书桌上的这十二卷《沈从文文集》，就在赫然地向我作着严峻的挑战。

一九八七年二月

（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